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 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袁成亮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

一

1931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劾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通电蒋介石在48小时内辞职,随后又于28日在广州正式成立“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各方反蒋的代表人物孙科、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李宗仁、陈济棠等也都集结在广州国民政府,在反蒋的旗帜下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驻守东北的张学良部在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命令下,不战而退,使东北大片国土顷刻之间沦为日军的铁蹄之下。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9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也趁此通电全国称:“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的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伏望全国同胞,一致赞助,促蒋下野,以挽危亡。”⁽¹⁾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不得不向粤方频频摇动橄榄枝,表示“和平解决”“共赴国难”,并于10月14日释放胡汉民以示诚意。而广州国民政府也表示,愿意在适当条件下,与南京政府“息争御侮”,并派汪精卫等人北上到上海与宁方代表李石曾、蔡元培等进行会谈。⁽²⁾此次会谈,就迫在眉睫的对日问题达成以下四点协议:(一)对外交涉由南京办理,(二)如果日军来攻,就应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退出国联。⁽³⁾10月28日,又决议“在日本未撤兵前决不日交涉。”⁽⁴⁾会谈还决定: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选出新的中央委员,然后合并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以产生新的中央政府。然而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胡汉民、陈友仁等因上海会谈没有提出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先决条件而指斥汪精卫等出卖广东派,声称:蒋不下野,粤方中委决不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则成为粤方攻击蒋介石最具威力的一张王牌。11月16日,胡汉民在上海称:“南京政府如继续推行‘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对日政策,必将亡国亡种。”⁽⁵⁾12月5日,以胡汉民为首广东派又发出公开通电,要蒋下野。在粤方强烈攻势下,蒋介石招架不住,便以退为进,暂避锋芒,于12月15日通电辞职下野,通电称“胡汉民同志等5日通电,且谓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沪”,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

主席本兼各职,另选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⁶⁾蒋介石下野后,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陈铭枢暂代行政院长。12月24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新政府,由于蒋虽下野,其势仍在,四大中委蒋系人物居多,因而会议宁粤双方争斗激烈,蒋作宾在其日记中述及此会时称:会议“提案毫无系统”,“徒求因人因利而争也。”⁽⁷⁾在会上,蒋介石亲信吴稚晖攻击广东派称:“国人全体前往拚死,有人暗中勾结敌如何!我欲驱敌使去,有人诱之使来又如何?我曾亲见广东某要人致沪某要人电,谓日本在东三省已发动,务须使之扩大,则易于倒蒋,有人敢驳我此说为不确实乎?!”并称这个卖国贼就在眼前。⁽⁸⁾25日会议讨论锦州问题时,吴又向广东派发难称东北事件“南京绝未卖国,卖国者另有其人,锦州之危,其咎不在张学良,咎在某某。”⁽⁹⁾孙科因此一怒之下离京去上海,并在上海发表讲话称:“南京派尽侮辱广东派,几目广东派为卖国奴,吴狗种种之侮辱,实不堪受,非于右任,陈铭枢、孙培德、何应钦在南京负责者亲来沪与予商洽,予不回京。”⁽¹⁰⁾后经南京派人多方劝说,孙科才重新回到会议桌上。经过激烈争论,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才决定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1932年元旦新政府正式宣告就职。孙科内阁成立后面临主要问题就是对日政策问题。新任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政府发表宣言称,政府主要任务是“消灭战祸,誓保主权,积极抵抗。”⁽¹¹⁾陈友仁还拟定了一份以“消灭战祸,保护主权,并于最短期间务达恢复失地之目的”为主旨的对日外交计划。与此同时,孙科同阁还大肆宣扬对日“绝交、宣战”,大造抗日声势。然而要改变以前政府对日政策并非孙科内阁说了算的。四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政会三常委对孙科内阁均采取不合作态度,蒋在奉化“不问政事。”汪精卫因前时上海和谈受到广东派指责而怨气难消,称病上海并请辞中央党部常委、中政会常委职。胡汉民也因蒋虽去而势力仍不愿前来而滞留香港。按道理,行政院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蒋、汪、胡三巨头不来南京合作,孙科内阁束手无策,哀叹“一切内政外交大计,行政院无所承秉,新政府决不能发生任何力量。”⁽¹²⁾为摆脱困境,1月9日孙科一行特到上海找汪精卫商谈,但被汪拒之门外而不得一见,蒋、胡经孙科内阁再三催促也依然不愿来宁。在中政会无法召集情况下,经孙科与冯玉祥等商议乃于1月13日,在中央政治会议名义下组织“特务委员会”,在中政会常委未到南京前“以应付困难和处理各项政务。”特委会以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为常委、孙科、陈铭枢、何应钦、于右任、陈友仁、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朱培德9人为委员。特委会成立后连日开会商讨对日政策,大多数委员均认为,对日“不能再循柔弱,应采取断然手段,虽然任何牺牲,亦所不惜。”⁽¹³⁾两广势力在会上所提对日绝交计划因蒋系阻挠虽未获通过,但陈友仁等“对日绝交宣战”调子却唱得更高了。其实,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其本意并非要真正对日开战,只要我们看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实际行动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6、7月份,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曾多次到日本东京与日本币原外相会晤,陈提出以尊重日本在满洲权益为代价,希望日本承认广东政府为中国正式政府进行谈判。⁽¹⁴⁾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1日,陈又到东京与币原会晤,“拟将满洲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来换取日本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¹⁵⁾由此可见,吴稚晖在四届三中全会上攻击广东派勾结日本之言辞并非空穴来风。孙科内阁成立后,虽一再电令张学良固守锦州,万勿撤退,但却不予一枪一弹。12月26日,张学良致电孙科内阁称:“日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要求迅速派兵支援。⁽¹⁶⁾然而,孙科内阁仍无半点援助。锦州之战开始后,12月29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以“损失过重,后援不继”为由下令锦州附近驻守军队撤入山海关。前方将领也

纷纷发表言论谴责孙科内阁称:此次失东三省之责,须邹鲁(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陈友仁负责,陈等种种勾结日人事实昭然。⁽¹⁷⁾但孙内阁却百般推御责任,12月31日,陈友仁对记者发表谈话称:“锦州驻军退入关内一事,过渡政府不负责任,应由张学良负责。”⁽¹⁸⁾1月3日锦州失陷后,日本为吸引国际注意力,以便为制造伪满洲国打掩护,积极准备进攻上海,但孙科内阁仍毫无战意,当日舰在南京至上海长江江面示威时,孙科内阁对日却毫不戒备。相反,还打算将驻在京沪一带对日持强硬态度的19路军调往江西剿共,以便使日方领悟他们“和平绝交”的本意,陈友仁在1月22日举行的中央委员谈话会上更露骨地说:“我们对日宣传绝交后,我们把所有的军队都开到江西去打共产党,表示我们并不对日本作战,以达到和平解决。”⁽¹⁹⁾

孙科内阁既然不愿对日开战,为何又要大肆渲染“对日绝交宣战”的气氛呢?其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为骗取国人对孙科内阁的支持。“九·一八”事变,随着东三省的沦亡,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已成为众矢之的,就连蒋介石本人也难以招架,有时也不能不做做表面抗日的文章,在其下野前的12月10日,蒋介石政府致电张学良要其切勿不战而退,“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²⁰⁾在蒋下野的第2天,12月16日,各地学生赴京示威团电汪精卫转粤方各委员,质问“新国府当局能否与日宣战?能否收回失地?能否退出国联?能否惩办张学良?若不能,抗日民众将与对待原执政者同等对待之。”⁽²¹⁾在此情况下,以“抗日”旗号进行倒蒋而上台的孙科内阁在抗日问题上不能不表现的“坚决”一些。同时,孙内阁还欲借“抗日”来获取民众支持以防止虽已下野但实力仍在的蒋介石暗中拆台。

第二,为取得国际对其政府的同情与支持。孙科内阁上台之时,日军正在积极谋攻锦州,美国因日本谋犯锦州违背日本对美所承诺的“日本对东北行动限于锦州以北”的诺言,因而,对日态度开始趋于强硬。⁽²²⁾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不承认日本侵占东北,并称凡违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条约者,美均不承认。这就是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由于美国态度的这种转变,一向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英法等国对日态度也趋向积极,英美等国对日态度的这种变化使孙科内阁感到要取得英美对新政府的支持,有必要配合英美等国对日态度“强硬”一番。对此,特委会两广势力曾解释说:“对日绝交非对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²³⁾

二

孙科内阁所倡导“对日绝交宣战”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早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因对国联公理解决东北问题的失望,便开始着手准备与日直接交涉妥协,以便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此,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起用一向主张与日交涉的顾维钧为外交部长,要其“布展其才华,发挥其天才”,“俾我国外交得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²⁴⁾不料顾刚着手与日交涉,便因蒋下野而连带辞职,对日交涉被迫中断。蒋对日交涉虽受此挫折,但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重续对日交涉之弦,因此,他深恐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激怒日本而断绝其日后对日交涉的通道。为阻止孙科内阁这一“冒险”计划,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针对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方针。为破坏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蒋介石不顾“在野之身”,决定重新出山,逼孙科内阁倒台。1月13日,蒋乘专机从奉化到杭州,14日,蒋在杭州为其重新出山辩护说“余山居谢客,不问政事,而在广东至今尚有防止蒋氏独裁复活等言论,且政治仍在割据之中,此次谢绝一

切,而尚不能见谅于人,何能再以此身出问政事?余若不出,人将谓不负责,余若出问国事,则必谓独裁复活,进退均无所逃于责备。故余只得以个人国民之地位,尽我党对国之忠心而已……当此内忧外患,余力所能及当贯彻赞助当局之初衷,惟熟审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余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以在野地位,尽个人职责。”⁽²⁵⁾为了排斥孙科内阁,蒋采取联合汪精卫政策,早在蒋下野回奉化故里前,蒋约汪派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称:“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传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²⁶⁾蒋介石此次到杭州后于16日亲函汪精卫要其来杭会谈,此函由陈铭枢带到上海后由顾孟余转交给汪,顾在转交此函时对汪说:“孙哲生搞不下去了,行政院长非公莫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当机立断。”⁽²⁷⁾权欲薰心的汪精卫接函后立即赶到杭州,17日蒋汪在杭州西湖烟霞洞进行会谈,此次会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商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²⁸⁾会谈结果双方达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分脏协议。为遮人耳目,同日,蒋汪致电胡汉民迅即入京共商国是。对于蒋汪之意,胡汉民了如指掌,为阻止蒋汪联合,胡以“需休养”为由拒绝入京并电蒋称“祇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的政策,而吾辈在野之身竭诚为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面,以付国人之期望。”⁽²⁹⁾18日胡又电蒋汪称,“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兄(孙科)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警告蒋汪勿插手孙内阁之事。⁽³⁰⁾但蒋汪对胡并不理会,为逼孙内阁下台,蒋还派飞机将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等人接到烟霞洞“会谈”,蒋露骨地称“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和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灭亡,故余不顾一切入京,以助林森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可尽天职而已。”⁽³¹⁾

三

孙科内阁在外交上因倡导“对日绝交宣战”而受到蒋介石派的压力与制肘,在财政上因蒋的暗中拆台也陷入困境。蒋在下野前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搬走财政部重要档案,遣散财政部科长以上职员。并且拖欠银行界1000万元债券不作交待即行离去。孙科内阁手无分文,催债者不断,孙科为此一愁莫展,哀叹说“现在政府一个月支出不敷达1600万元”,“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5万万元,但除还债项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元,欲再发公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以是影响到外交军事种种问题。”⁽³²⁾此外,孙科内阁因空喊“对日绝交宣战”而无实际行动也遭到舆论谴责,美国除空嚷一阵“不承认主义”外再无下文,而英国态度更趋消极。孙科内阁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内部斗争更趋激烈,为摆脱困境,孙科一反前嫌,求助于蒋介石。对此,蒋作宾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闻阿科新政府因分脏问题屡起斗争,环顾四周,空气也知不妙,欲结蒋以固位,无如不满之风声已播,恐难达弥月之期。”⁽³³⁾1月21日,孙科赶到杭州请蒋回京,然蒋汪早已达成联合协议,蒋对孙科非但不合作,反与汪精卫联袂入京,特委会陈铭枢等人见蒋汪合作已成定局,“对日绝交宣战”已入绝境,便倒向蒋汪。1月22日,在南京举行中央委员谈话会上,陈友仁继续倡导对日绝交宣战之主张,陈铭枢起而反驳说:“前几天,我所以不反对绝交,是因为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我们决不妥协,尽我们力量去做,二是我们屈服。如果我们对日不妥协、准备和他宣战的话,那么绝交是第一步表示我们的决心,所以我并不反对。现在我们为达到和平目的而绝交,我是不能赞成的。”⁽³⁴⁾陈铭枢等人的“倒戈”,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再也唱不下去了,而蒋介石、汪精卫在1月23日下午的会议上,力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并对陈友仁对日绝交大加指斥认为“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

久。”⁽³⁵⁾孙科为保住行政院长的职位,也表示支持蒋汪主张并按蒋汪之意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本日下午与蒋汪两先生评商应付上海事件,金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能采取和缓态度”⁽³⁶⁾但蒋介石并不因此罢休,非要赶走孙科内阁不可,他对蒋作宾说:“应对于日本外交宜求一迅速了结方法,政府无能力应设法改组。”⁽³⁷⁾同日,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蒋汪等又大肆攻击陈友仁外交方针,并借此责难孙科政府。在此情形下,孙科与陈友仁及财政部长黄汉梁愤而被迫离守赴沪,陈并在上海发出辞职通电。蒋汪见赶走孙科内阁目的已达,便于1月24日在南京召集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问题,蒋汪在会上称“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并指斥“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妄作孤注之一掷”,“作博民众之彩声而于国难毫无利益,且足以使时局不能善后”,表示“将以忍辱负重,同时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³⁸⁾会议决定对陈友仁辞职不予挽留。1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置日本侵华于不顾,决定“先团结内部后定对外方针”,而陈友仁到上海后继续以“抗日”旗号进行反蒋,25日,陈友仁在沪发表宣言称:“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蒋氏至今实力犹存,而其反对余之外交主张又若是其坚决,此余所以不能不即日辞职以谢众。”⁽³⁹⁾孙科也电国府主席林森,要其“另选贤能,免误国是。”⁽⁴⁰⁾

孙、陈既去,南京政府“对日绝交宣战”呼声也随之消声匿迹,蒋介石为防止此种论调再起,便于1月27日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成立外交委员会,以蒋作宾、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委,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并对外交委员会权限作了明确的限制:一,外委会只对政治会议负责,二外委会对外不发表命令,三外委会决议案由外交部长执行,四外交重要方针,外委会须提清政治会议决定之。⁽⁴¹⁾这样,蒋汪便通过中政会牢牢地把持了外交大权(中政会三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胡拒绝来宁,中政会实际由蒋汪主持),外委会无权决定外交方针,且不得对外发布命令,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再加上新任外委会成员多主张对日交涉,这又为蒋介石恢复对日直接交涉铺平了道路。1月28日中政会宣布接受孙科、陈友仁的辞职,并决定由汪精卫组阁担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罗文干接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经汪精卫提议,中政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这样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体制正式告成。通过这种体制,蒋介石将汪精卫推到前台办理最为棘手的对日交涉妥协事宜,而自己在幕后进行牵制、操纵,同时又可以军人可不负责的身份唱唱“抗日”高调,欺骗舆论以免重蹈下野的覆辙。无怪乎汪精卫称自己与蒋介石此次合作是“跳大坑。”尽管如此,面对群情激烈的抗日情绪,汪精卫虽极力反对陈友仁“对日绝交”,但也不敢放弃口头“抵抗”,因此,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便亮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旗帜,实行“假抵抗,真妥协”的对日政策。对此,汪后来承认说,1932年1月28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长,我提倡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我当时的用意,仍是本于冤仇宜解不宜结的观念,想从局部的暂时的安定,进而谋全国的永久的和平。”⁽⁴²⁾1月31日,汪精卫发表演说,为其对日政策辩解称:日本“不但侵略中国,而且侵略各国,不但中国对日有正当防卫之权利,各国对于日本有干涉其野蛮举动的义务,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⁴³⁾但蒋介石对汪精卫仍放心不下,汪刚刚上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便按蒋旨意去劝汪不要涉及军事,称“蒋先生最怕过问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不要过问军事。”⁽⁴⁴⁾这样,即使汪欲摆摆抵抗架式,因无军权也是徒然。而蒋介石为确保自己意愿的实施,却能随意“干政。”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蒋派人专程到南京送两封信给林森及在京其它国民党军

政委员称：“抵抗是其心愿，宣战万万不可，因为宣战是以国家为孤注一掷，我们万万不能，要以国家存亡为重。”⁽⁴⁷⁾继孙科内阁之后的蒋汪合作体制，就其实质来说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所谓“对日绝交宣战”只不过是一场用来获取国人及国际支持以巩固自己地位的骗局，并非要真正起而抗日，它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因而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对此，宋庆龄在《申报》发表宣言称：国民党早已丧失革命集体之地位，谴责宁粤双方同为革命罪人，号召真正之革命者奋起斗争。⁽⁴⁸⁾正因如此，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不仅未能加强其地位，反而成了自身灭亡的催命符，蒋介石通过拉汪排孙的策略，多方面干预，致使孙科内阁土崩瓦解，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其臭名昭著的“对日绝交宣战计划”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废纸篓。

注释：

(1)(4)(9)(21)(29)(30)(35)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中国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1931年，第156、193、212、247、240而第十八辑1932年第14、15、18页。

(2)(6)(27)(32)程思远：《政坛回忆》，第52、56、57、57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19)(34)(47)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对日政策》，台北《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6编《对日抗战》上第23、23、23、22页。

(7)(8)(10)(15)(17)(28)(37)(41)《蒋作宾日记》第394、394、394、360、398、401、403、4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1)(18)(48)任泽全：“‘九一八’到‘一二八大’事记”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1、2期。

(12)北平《晨报》1932年1月6日，转引自郭大均：《九一八至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3)(23)(25)(31)(36)温泽济：《九一八到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第233、233、234、234、235页，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14)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61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

(16)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76页台北中正书局1977年版。

(2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3页。

(22)陈旭麓主编：《五四后三十年》，第296—2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4)《蒋委员长全集》，第277页，上海国泰书店1937年版。

(26)(38)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39)(40)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第48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1)(日)堀场一雄《日本侵华战争指导史》第2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5)《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七期。

(46)陈公博《苦笑录》第222页。

(袁成亮，1964年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政治系讲师)

[责任编辑：李子龙]